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毛主席**

**关于文化遗产批判繼承和
封建社会的部分论述**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关于文化遗产批判继承 的部分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语录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马克思：《致R（卢格——编者注）》（1843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页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马克思：《致R（卢格——编者注）》（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6页

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

马克思：《致R（卢格——编者注）》（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7——418页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25页

我们所要批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越严厉。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98页

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批判没有必要表明自己对这一对象的态度，因为它已经清算了这一对象。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感情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29页

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1858年10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628页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

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1—272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我们先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作例子，然后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①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②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

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他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这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

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第112——114页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4页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8页

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9页

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

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1870年5月——7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573页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2页

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5页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它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也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

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 *de guerre lasse* [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我们并不象白尔尼和门采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 *menus plaisirs*③。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

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着他的整个时代、他的文学前辈和同代人来描写他，也不能从他的发展上和结合着他的社会地位来描写他。因此，我们仅限于纯粹叙述事实而已。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1846年底——1847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56—257页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象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她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

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463页

现代英国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他们描写了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那把各种“事物”轻蔑地看作某种庸俗事情的“极可尊敬的”食利者和公债持有者，一直到小铺老板和诉讼代理人。如同狄更斯、夏洛特·勃朗蒂和哈克尔夫人所描写的那样，他们都是自命不凡，拘于小节，欺压弱者，不学无术。文明世界证实了那以痛斥的警句形式对这一阶级所下的判决，这个警句是：对上谄媚，对下欺压。

马克思：1854年8月1日《纽约论坛》上的论文，〈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402页

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中只起着这样从属的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这个文化为对象的批判决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换句话说，能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决不是观念，而只是外部客观现象。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尽量确切地把两种事实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确切地把一系列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各个发展阶段间的联系研究清楚。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4月）《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3页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欢迎青年学生中蓬勃的革命主动精神，责成所有党的组织尽力协助这些青年实现其组织起来的愿望，并劝告所有学生团体和小组：第一、在自己的工作中应把培养本团体成员的完整而彻底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当做首要任务，一方面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研究俄国的民粹主义和西欧的机会主义，研究这些进行着斗争的现代各先进思想派别中的主要思潮；第二、对青年的那些假朋友提高警惕，他们正在用革命的或唯心主义的空话，用革命派和反对派间的激烈争论是有害的和不必要的这种悲天悯人的蠢话，使青年忽视认真的革命教育，因为这些

假朋友实际上只是在宣扬无原则性和对革命工作的轻率态度；……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03年6——7月）《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426页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东西，怎么能叫做镜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有许多社会分子也显然没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们提出的真正历史的任务。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1908年9月）《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
176页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非常有力地、直觉地、真诚地反对社会的撒谎和虚伪；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一方面，

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状况。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毁坏着。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反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反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人这样反对）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把他学说中的糟粕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

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1908年9月)《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

179—180页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正是既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也表现了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他对国家、对警察和官方办的教会的那种强烈的、激愤的而且常常是尖锐无情的抗议，表达了原始的农民民主的情绪，在这种原始的农民民主要求里积累了农民群众由于几世纪以来农奴制的压迫，官府的横暴和劫掠，以及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而发出的极大的愤怒和仇恨。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在这个历史时期，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度（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度和官家的“份地”制度），完全变成了俄国今后发展所必须消除的障碍，当时这种旧的土地占有制度必然要遭到急遽的无情的破坏。他充满最深沉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断的揭发；这种揭发表达了宗法制农民的全部恐惧，因为在农民面前开始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和不可理解的新的敌人，这个敌人不知是从什么城市或是从什么外国来的，它破坏了农村生活的一切“基础”，带来了空前未有的破产、贫困、饿死、野蛮、卖淫以及梅毒——“原始积累时代”的一切灾难，而这些灾难又由于息票先生所创造的最新的掠夺方法被移植到俄国土地上而百倍地加重了。

但是，这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这种不理解只是宗法

制的天真的农民才会具有，而不是一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作家所应有的。反对农奴制的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政权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否定政治，形成了“对恶不抵抗”的学说，结果完全避开了1905——1907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一方面反对官方办的教会，另一方面却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即用一种清洗过的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否定土地私有制，但并没有集中全力去反对真正的敌人，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而只是发出幻想的、含糊的、无力的叹息。揭发资本主义以及它给群众带来的苦难，但同时却对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全世界解放斗争抱着极其冷漠的态度。

托尔斯泰的观点中的矛盾，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矛盾，而且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这些东西决定了改革后和革命前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心理。

所以，只有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才能对托尔斯泰作出正确的评价，因为无产阶级在最初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在革命的时候，已经用自己的政治作用和自己的斗争，证明它的使命是在于担任领袖来领导争取人民自由和争取把群众从剥削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斗争，证明它是绝对忠于民主主义事业的，证明它是能够同资产阶级的（也包括农民的）民主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进行斗争的。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1910年11月16日）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22——324页

托尔斯泰去世了，革命前的俄国也成了过去，——它的弱点和无力曾经被这位天才艺术家表现在他的哲学里和描绘